

读史忆人 典故

陶行知坚守招生规则

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一句经典名言“千教万教教人求真，千学万学学做真人”。他是这一名言的践行者，他自己就是一位“真人”！他严格遵守招生规则，对所有考生都一视同仁，在这里没有特权生，也没有“优等生”。

1917年秋，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时，主管新生招生，他高度重视招生工作。在学校召开的招生大会上，他对负责招生的老师特别强调：每一个招生的工作人员都要高度自律，洁身自好，绝不允许出现违规招生的情况，绝不允许有“特权生”的出现。招生是一件大事，因为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。我们要经得起考验，抵得住诱惑，决不能做出对不起家长和考生的事情。一定要坚守招生规则，让每一位家长和考生都对我们的招生工作有口皆碑、心服口服。

招生开始后，一官宦子弟落榜后，给陶行知打来电话说情，陶行知二话没说，决然拒绝。该官员不死心，第二天派其秘书前来求情。陶行知一脸严肃地告诉对方：“敝校

招生，一向按成绩录取，否则，就失去了准绳。今年没考上，就要下一番工夫，明年说不定就能考取。人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达到目的，而不是通过交易来达到目的。我们要按规则招生，谁都没有权利违规招生。”

看到陶行知毫不松口，秘书便拿出了“撒手锏”：“陶先生年轻有为，又有留洋学历，只要在这件事上给个面子，今后定能平步青云。”说罢，就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银票，然后满脸堆笑地递上：“这是我家先生的一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，还望陶先生笑纳。”见此，陶行知哈哈大笑道：“我背一首苏轼的诗给你听吧：‘治学不求富，读书不求官。譬如饮不醉，陶然有余欢。’请你回去告诉你的先生，恕行知不能从命。”秘书见无望，面带愠色，从桌上拿起银票，悻悻离去。

消息传开，陶行知坚守招生规则的品行，得到了所有家长和考生的高度赞扬和一致好评。同时，再没有人登门找陶行知说情了。

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)

拾遗

高莽：成就斐然 谦虚豁达

高莽不仅是我国著名的作家、画家，还是俄语翻译界的泰斗级人物，曾任《世界文学》主编。在担任《世界文学》主编之前，有许多人认为高莽就是一个画画的，所以在他当了《世界文学》主编后，有不少人给《世界文学》的主管部门写信责问：“偌大的一个中国，居然找不出一个搞文学翻译的人来当主编，为什么要找一个画画的来滥竽充数呢？”高莽得知此事后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不能怪他们，有时候我也以为自己就是一个画画的，谁让自己平时喜欢涂抹几笔呢。”

其实，无论在翻译上，还是在写作上，或是在绘画上，高莽的成

就都很斐然。高莽的译著从来不曾署他的本名，而是署乌兰汗(红色的汉子之意)、何焉、雪客、肖儿、竹马、野婴之类的笔名，为此还闹出过一个大笑话。1949年初，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戈宝权赴苏联途经哈尔滨，想和几位俄文翻译家开个座谈会，于是便列了五六个翻译家的名单，然后一一发出邀请，结果到会的只有高莽一个人。这让戈宝权感到很奇怪，对高莽说道：“其他几个人怎么迟迟不到会呢？”高莽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您名单上列的几个人，其实都是我。”戈宝权很惊讶，弄清原委后，不由得笑弯了腰。

(据《天津日报》)

石经：古代的标准教材

说到学习备考，自然离不开教材和教辅。我国的教材起源很早，先秦时期的官学便有了教材。

西周官学的教学内容，主要是六艺，即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只不过因为年代久远，现在的人们已经找不到当时的教材了。不过，《汉书》中对此曾有记载，周宣王时期的太史史籀曾经编撰过一套《史籀篇》，里面共收录有15篇课文。目前，《史籀篇》是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儿童启蒙课本。春秋末期，孔子创立私学，并修订《书》《诗》《易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等“六经”。到了汉代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，“独尊儒术”。此后，历朝历代，都将儒家经典当作学习教材。

不过，印刷技术的发明始于唐代，直到宋代才出现活字印刷术。在没有印刷术之前，人们学习的教材，大都依赖于手写传抄。这样虽然能够加深记忆，但在流传过程中，也容易出现笔记潦草难辨或者笔误。为了克服这样的问题，当时的统治者想到了一个办法——刊刻“石经”，即将经过编选的标准教材刻印在石头上作为示范，以后天下学子的教材，就有了参考的权威版本。这项文化工程从175年一直持续到183年才完工，耗时8年，史称《熹平石经》。此石经共有46块，每块高3米多、宽1米多，成为当时的标准教材。对此石经，《后汉书》中称：“及碑始立，其观视及摹写者，车乘日千余两，填塞街

陌。”前来传抄学习的人络绎不绝，甚至造成了交通堵塞。

到了三国时期，曹魏建都洛阳，太学再度繁荣起来。由于历经了东汉末年的战乱，《熹平石经》损毁严重，所以，曹魏的第三位皇帝曹芳决心整理《熹平石经》碑石，并加刻了部分经石作为补充。于是就有了从241年开始刻制的《正始石经》。这个版本的石经以古文、隶书、篆书等三种文字刻成，所以又被称为《三体石经》。

唐朝的唐文宗，也开展过类似的文化工程。开成年间，他曾命人将儒家九经与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尔雅》等12部儒学经典刻在石碑上，并立于当时的国子监，以此作为当时官方统一的标准教材，史称《开成石经》。显而易见，古人刊刻《石经》，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教材的准确性和权威性，为天下学子提供可供参考的标准教科书。

后世将《熹平石经》《正始石经》《开成石经》合称为我国古代著名的“三大石经”。到了宋代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让教材的出版进入了便捷化、规范化的轨道。所以，以“石经”来规范教材的需求大大降低。不过，后世还有一些统治者开展过刊刻“石经”的工程。比如，南宋的宋高宗曾在临安刊刻过《南宋石经》；清乾隆年间，也曾将儒家的13部典籍刊刻后立于京师国子监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相较于活字印刷术发明前的“石经”，这些《石经》，其主要作用偏重于彰显儒学的权威性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古代学子如何欢度“毕业季”

古代的学子们并没有明确的毕业时间。所以，学子们的“毕业”时间其实也就是金榜题名之时。金榜题名者会以什么方式来庆祝“毕业”呢？

从乡里到朝里，各种庆祝活动是少不了的。除此之外，就是举行“毕业旅行团”。能参加这个旅行团的，当然都是榜上有名的新科进士。旅行的内容，一是赏春。正值

人生春风得意之际，且放榜又多是在春季，欣赏一番大好春光，自然是少不了的。二来，就是各种酒宴。借着各种酒宴应酬，联络感情拉关系。最后一点，古代的“毕业旅行团”相当程度上也是“相亲旅行团”。各级官员，甚至皇帝，只要家中有待嫁闺女，都很重视新科进士这一年轻有为的群体。

(据《天津日报》)

韦岗战斗：新四军挺进江南的第一战

1938年6月17日，新四军先遣支队在司令员粟裕的带领下，采取“隐蔽进入、突然袭击、迅猛歼敌”等战法，利用韦岗地区有利地形，仅用半小时就干净利落地伏击了日军汽车运输队，取得了新四军挺进江南后的首战胜利。

东进江南 宣传发动群众

1938年4月24日，根据中共中央关于“主力开泾县、南陵一带，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”的指示要求，新四军军部决定抽调400余名精干力量组建先遣支队，由粟裕任司令员，率部东进江南实施战略侦察。

4月28日，粟裕率领先遣支队誓师东进。针对江南地区全面沦陷、日军气焰嚣张、匪患伺机而动、人民遭受蹂躏等实际，粟裕指挥先遣支队一边进行战略侦察，一边广泛组织宣传政策、发动群众等工作，要求全体指战员以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为准绳，做到秋毫无犯，并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，积极开展统战工作，以模范行动向江南民众展现新四军的精神面貌和作风纪律，使得江南地区民众逐步了解共产党、熟悉新四军，并形成“遇到新四军，亲如一家人”的情感认同，积极主动踊跃加入新四军。同时，先遣支队还感召了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当涂县采石镇邮电局长刘一鸿，使其率部加入新四军。

慎重首战 精选伏击地点

5月4日，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新四军军部命令，陈毅率第1支队由皖南东进，并于6月8日与先遣支队在溧水新桥胜利会师。随后，遵照中共中央关于“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”指示，新四军向苏浙皖边挺进，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纲领，号召各阶层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。

然而，在上海、南京、杭州等大中城市和战略要地相继被日军占领，江南地区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，加之当时刚刚改编的新四军部队人员数量少、武器装备差的情况下，国民党军队和当地民众普遍对抗战胜利失去了信心。粟裕经过认真研究后，决定尽快打一场胜仗，以激发江南民众抗日热情、打击日军嚣张气焰、鼓舞部队士气斗志。为确保“第一仗必须打胜，不许打败”，粟裕经过反复研读地图、熟悉地形、侦察敌情，决定将作战地点选在“韦岗”，将伏击时间定在6月17日8时至9时之间。韦岗位于镇江西南15千米，其东、西两侧为小山地，东侧马鞍山高198米，西侧高骊山高455米，镇(江)句(容)公路蜿蜒穿过两山，是日军运输车队必经之处，也是较为理想的伏击地域。



位于江苏省镇江市的新四军韦岗伏击战战场遗址。

快袭快撤 顺势隐蔽布阵

根据第三战区“派兵一部，挺进南京、镇江之间破坏铁路，以阻击京沪之敌，务于3日内完成任务”的命令，新四军军部指示由粟裕率先遣支队及第1支队共4个连的兵力，赶赴南京至镇江之间的下蜀车站执行破坏铁路任务。6月15日夜，粟裕率部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，顶风冒雨一举破坏了下蜀车站附近的铁路和电线，切断了南京、镇江之间的铁路运输线，随后迅速撤离至下蜀以南20千米处的东谢村休整。

破坏铁路的任务已经完成，粟裕随即召开干部会，决心顺势展开伏击日军运输车队的作战部署，他决定亲自带领90余名精干战斗人员，采取“夜间行军、隐蔽进入、突然伏击”的战术，在韦岗地区伏击日军运输车队，主力则隐蔽待命，随时实施支援。16日午夜，粟裕率参战分队冒着大雨从下蜀后山出发，伏击分队在能见度极差的条件下，在曲折蜿蜒且湿滑的山道上艰难前行，于17日凌晨到达韦岗以南的赣船山口，并隐藏在树林中修整待命。随后，伏击分队指战员紧前进行临战准备，并针对缺乏伏击敌运输车队经验的实际，广泛发动战士积极研究讨论，大胆出主意、想办法。

17日黎明，粟裕在简短的战斗动员后，即命令伏击分队进入伏击阵地待命。

迎头痛击，迅猛开火歼敌。17日8时许，日军车队5辆车由镇江方向驶来，待气焰嚣张的日军运输车队大摇大摆地驶入伏击圈，粟裕即命令机枪班迎头齐射，使得日军头车冲出公路、撞上岩石。后续日军因受公路弯道视野的限制，毫无防范地接踵而至，粟裕当即命令部队迅猛开火，击毙了日军少佐土井，击中了日军后续3辆汽车。尾车见势不妙，立即停在伏击分队火力射程之外，30余名日军纷纷跳车，依托公路两侧有利地形负隅抵抗。此时，伏击分队在冲锋号声中，如猛虎出笼般居高临下冲下山坡，英勇向日军发起冲击，残敌见状纷纷爬上尾车仓皇逃回镇江。经半小时激战，我军击毁日军汽车4辆，毙伤日军20余名，缴获长短枪20余支及军用品一部。

韦岗战斗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意义非同一般。韦岗首战，旗开得胜，极大地鼓舞了江南民众的抗战热情，激发了我军指战员抗击日军的斗志和信心。陈毅接到捷报，当即赋诗祝贺：“弯弓射日到江南，终夜喧呼敌胆寒；镇江城外初遭遇，脱手斩得小楼兰。”

(据《中国国防报》)

文人扇胸武人扇肚 古人摇扇有讲究

扇子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，隐藏着很多趣味和内涵

炎炎夏日，在过去没有电器的时代，人们如何消暑纳凉呢？这时候扇子就成了消暑的主角。西汉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中已明确提出“以扇逐暑”，就是靠着扇子作为避暑的宝贝，也因此扇子在中国起码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

由于扇子造价低廉，用途简易，加之可以成为自己的一件随身物件，扇子一直深度伴随着古人的生活。

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 身份不同功能亦不同

历史上曾有一种用细竹篾编制的扇子称为便面或障面，不仅可以摇出清风，还可以用于遮面容，因此成了古代美女或者文士必备的消暑神器之一。南北朝著名的文人庾信，写过一句话叫作“分杯帐里，却扇床前”，从此之后，扇子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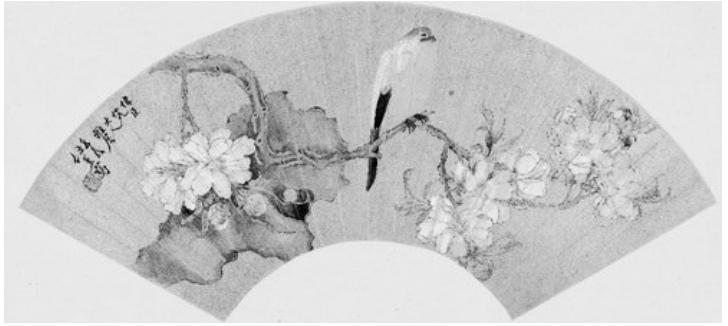
汉成帝的宠姬还写过一首团扇歌：“新裂齐纨素，皎洁如霜雪。裁为合欢扇，团团似明月。”有趣的是在这之后扇子竟然成为女子被丈夫遗弃的一个比喻，仿佛有用的时候拿来消遣，无用了便抛在一边。

因此扇子的使用功能似乎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寓意内涵，更为形象而生动。那么扇子是如何使用呢？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奇怪，按理说不就是摇动着纳凉吗？

扇风谁都会，可如何扇风在过去是有讲究的。俗话说，文人扇胸，武人扇肚，农民扇背，和尚扇领口，轿夫扇裤裆，青士扇袖筒，可见扇子对于身份不同的人来说，功能是不一样的，这似乎是身份、品位所决定的。之所以这样，除了考虑到要在各自职业特点和穿着打扮的界定下，实现进风量的最大化，还要顾及自己的体面。文人最讲面子，哪怕要热死也只是把一把小扇子扶在胸前，轻轻地扇风，慢慢地摇。而青士则擅长看书，挥毫泼墨之余，用扇子扇一下袖筒，这样就能达到“两袖清风身欲飘”的效果。



唐 阎立本《步辇图》中的长柄礼仪之扇。



清 任薰《花鸟扇》

东晋丞相谢安成功“带货” 五万把蒲葵扇转眼卖光

在古代，家家几乎有扇子，而最普遍的就要数蒲扇了，这是一种植物，形状有点像芭蕉，因此也有“芭蕉扇”的称呼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找铁扇公主就是要借芭蕉扇，最终死缠烂打借了出来，扇灭火焰山的火，解除了一地的苦恼，扫去了西去道路上的障碍。

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中记载，大书法家王羲之在绍兴任右军时，见一老妇卖扇艰苦，便把她的白扇子取了过来，各书五字，老妇不解。王羲之说：“但言右军所书，每扇索百钱。”老妇依言而行，扇子被一抢而空。

至于大臣持扇趣闻，东晋丞

相谢安值得一提。《续晋阳秋》记载，谢安的一位老友拜访他，辞行时，谢安细心地问他盘缠够不够，同乡不好意思说自己没钱了，但还是希望能够得到谢安的帮助，想了想就来了个转弯说：“如今我身上只有五万把蒲葵扇。”谢安听了微微一笑，自然心领神会。于是谢安就拿了一把蒲扇开始给他做广告，只要出门会客，都会拿着蒲扇在朋友面前摇来摆去。在名人效应的带动下，许多人开始跟风去买这个人的蒲扇，转眼五万把蒲葵扇全部卖完，堪称史上第一次成功的“带货”。

能表达态度或意见 还曾在宫廷中流传

扇子不仅能够表达一种身份和风度，还能在某个环境中成为自己对外展示态度或者意见的方式。《世说新语》中有这样一个片段，西晋大将军王敦每次回府见武侯侯的时候，都会用扇子遮一下脸，等到了南渡之后再见时却不再这样做了。王敦还感叹说：“不知是我长进了，还是伯仁退步了。”这说明随着王敦地位的改变，再见到这位曾经显赫的人物后不再羞涩，显然是一种自信的表现。

除了这些人物外，扇子也会在宫廷中流传，只不过扇子更为精致、高贵或者扇子更大罢了。在唐代有一种叫作“仪仗扇”的东西，这个在阎立本的《步辇图》中可以看到，这种扇子除了能够显示身份独特外，还能遮挡刺眼的阳光和风尘，尤其在户外时颇为壮观。只不过拿着这些仪仗扇的人很是辛苦，遇到大风就要被吹得前仰后合。不知那时皇帝是否会体谅，叫他们收了扇子。



明 仇英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制扇铺。

(据《厦门晚报》)